

空间生产视角下大运河文化遗产重生的过程与机制

——以扬州运河三湾生态文化公园为例

侯兵^{1, 2} 金阳² 胡美娟²¹

(1. 扬州大学中国大运河研究院, 中国江苏扬州 225009;

2. 扬州大学旅游烹饪学院, 中国江苏扬州 225127)

【摘要】: 遗产重生是强化遗产价值认知、促进遗产保护与传承、增强和提升文化自信的重要课题, 空间生产理论在审视社会空间形态与文化生产演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为分析遗产重生的过程与机制提供了解读视角。大运河作为一类巨型的线性文化遗产, 难以全景分析遗产格局状态和演化机制, 针对其中节点开展空间生产演化研究, 是揭示遗产重生过程与机制的基础性工作。以扬州运河三湾生态文化公园为例, 运用土地利用变化指数模型和 GIS 技术, 从空间形态层面刻画遗产重生的物理形变过程与特点, 进一步通过查阅志书和访谈分析探究遗产文化生产变迁历程, 从空间生产视角揭示遗产重生机制。结果表明: ①遗产重生过程分为农居空间、工业空间以及生态文化空间三个阶段, 每一阶段功能区布局和空间形态规律不一。②遗产空间形态的变化, 反映了遗产地不同阶段文化脉络及空间生产方式与内容的差异化特征, 空间嬗变具有不同属性的特征。③遗产空间在工业化阶段出现断层, 而在生态文明建设指引下, 空间生产的三元主体共同作用, 推动了运河遗产重生。

【关键词】: 空间生产 遗产重生 形态演变 机制 三湾生态文化公园 文化遗产 土地利用变化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8462 (2022) 03-0160-12

2020 年 11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扬州运河三湾生态文化公园时指出:“保护好利用好古运河文化遗产, 推动古运河重生”。这一重要指示精神, 对于今后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古运河意义重大^[1]。作为巨型体量的世界文化遗产, 推进运河遗产重生成为理论和实践两个领域的重要任务。从学理上看, 遗产重生问题在学界尚未充分阐明, 与之紧密相关的另一概念是遗产再生。这一主题的研究聚焦于建筑遗产和工业遗产, 主要借助于社会记忆理论和场所理论等视角, 探讨遗产改造利用过程中文化和精神的传承问题、对城市更新的重要价值, 揭示其在生产中心到消费场所转移过程中的功能转化与驱动机制^[2-5]。此外, 以传统手工艺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如何充分融入现代社会的生产生活, 体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要求, 同样是实现遗产重生或再生的重要话题^[6]。综合现有相关研究, 本文尝试将遗产重生界定为: 因各种原因丧失原有属性和功能的遗产地经修复、改造和更新后, 重现原始面貌或是形成新的功能和价值的过程, 其内涵包括遗产客体本身和遗产价值的双向度重生。

相较而言, 运河遗产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遗产重生具有更为复杂的发生机理和演化过程。遗产价值源于过去, 具有时间矢量双向延伸的特征^[7], 既受当下和未来发展所支配而又表征着过去^[8]。在空间表现上, 遗产折射出空间生产形式与空间形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1771146); 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培养项目 (2018-2021)

作者简介: 侯兵 (1978—), 男, 江苏盱眙人, 博士, 教授, 研究方向为遗产旅游、旅游地理与旅游规划。E-mail: bhou@yzu.edu.cn

态演替的规律,可视为时间序列下的空间生产过程,映衬着时间属性下的价值变化。经济社会发展引致的遗产文化变迁与空间演化,一方面使得遗产文化空间受到挤兑和冲突,悠久的历史文化逐步消弭成碎片化^[9],遗产空间走向变异,面临着“空间区隔”的断离^[10]。另一方面,随着多元社会关系与生产行为的嵌入,人一地一物通过遗产形成有意义的连接^[11],遗产空间的发展逻辑与空间生产的历史逻辑在不断调适中完成自洽^[12-13],遗产形态发生深刻的变化。运河遗产功能与价值随社会发展而变更^[14-15],从国家视野看,运河由物资调配和漕运输送功能,延伸出河政治理、文化表征、家国认同等当下世界文化遗产功能^[16],亟需加强历时性下社会要素对遗产形塑的探讨,以全面展现遗产重生的演化过程,寻求“时间—空间—社会”关系的统一^[17]。囿于当前相关研究极少涉及遗产空间本身的生产及其演化,讨论视角局限于空间内的生产,更缺少对遗产重生机制的剖解,由此提出的论据和观点可能不够全面或深刻。空间生产是遗产功能转化的主要动力^[18],运河遗产出现一变异一重生的逻辑主线是什么?文脉和空间在遗产重生过程中发生了何种演化及演化机制是什么?立足新发展阶段的遗产保护传承利用,这些问题亟需得到回应。此外,厘清运河遗产重生的过程与演化机制,对理解遗产客体丰富内涵及其背后复杂结构也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19],对探析遗产共时性、历时性和真实性建构具有深刻的先导作用^[20-21],对遗产如何实现活态化保护具有重要意义^[22]。

遗产地空间形态是文化建构下的物质表征,线性文化遗产中起连接作用的途径包括物理连接和精神关联两类,共同构成文化遗产的两类空间^[23]。其中,土地利用功能的变化是物理空间的具体表现,与实践层面共同反映遗产地的空间嬗变特征,在空间面貌趋同和文化同质的背景下,如何唤醒我们的记忆,使物理空间转变成具有社会意义的场所^[24],成为重要的现实话题。空间生产理论将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归为一体,全面反映空间(物理、社会、文化空间)的变化。“三元一体”理论也将复杂社会关系中的多元主体纳入系统的阐述框架,对遗产重生的机制分析具有较好的适用性。作为大运河遗产的节点之一,扬州运河三湾生态文化公园原先并非文保单位或旅游景区,在经历了“遗产边缘化—遗产断层—遗产重生”三个阶段后,遗产空间形态和价值在较短的时间内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在世界文化遗产的叙事作用下,基于地方历史和文化符号化的再生产而形成新的空间形态^[25],从中体现出了文化生产与再生产方式的变化,可作为遗产重生的微观写照。本文以此为案例,将定量与质性研究结合,从遗产的空间演化规律揭示其空间表达的更迭历程,在此基础上建构遗产重生的内在规律和发生机制,为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提供借鉴参考。

1 理论基础

1.1 空间生产理论

继马克思“空间批判”思想之后,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提出的空间生产理论掀起了社会学研究“空间转向”的热潮^[26]。“空间的生产”是各种社会要素和力量对空间进行开发、设计、使用和塑造的过程^[27-28]。在此过程中,空间突破了僵硬的物理形态束缚,从物化实体延伸至精神和社会领域,并逐渐扩散至整个社会结构,一切社会实践都被囊括入空间的建构范畴^[29]。空间成为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的映射,反映了社会生产的过程,“空间的生产”也是空间本身的生产^[30]。空间的“社会化”为空间理论研究开辟了新视野,搭建了地理学与社会学交叉研究的桥梁。

“三元一体”理论是空间生产理论框架的核心,通过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Space)和表征空间(Spaces of Representation)三组维度解构空间生产的过程^[31]。空间实践属于被感知的维度,是(社会)空间中的具化物品生产和再生产的场所,反映了日常生活中的物质生产实践。空间表征属于被构想的维度,由权力话语(统治者、资本)和知识(科学家、规划师)所支配,是概念化的空间。表征空间属于直接经历的空间,是居民和使用者的空间,处于被支配的消极地位^[32-33]。三者相互包含却又相互区分,分别对应着自然、社会和精神空间。其中空间表征与表征空间属于对立关系,后者对前者具有颠覆力量,空间实践则在两者的博弈、拮抗和互动中不断变更从属地位^[34]。因此,在不同空间形态中,“三元一体”框架呈现不同的逻辑关系。

1.2 资本三级循环理论

资本是空间塑造的重要动力，哈维构建了“资本三重循环”模型，阐明了资本在空间中的生产和流通逻辑^[35]，体现了经济转型的研究范式。第一重循环是资本投入工业生产，指向一般性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当工业生产过剩时，资本开始投向空间介质，即对社会环境和城市建筑进行投资，这是第二重循环。而为了解决第二重循环生产过剩问题并且稀释和协调表征空间的抵抗，资本进入了第三重循环，即投向科学研究和教育、文化和卫生等领域^[36-38]。

在空间的场域延拓中，旅游引致的空间生产作为一种代表方式逐渐得到关注和重视，为解构旅游地社会和自然空间勾勒出新的研究范式^[39]，从中也反映了目的地各种生产方式和社会要素对旅游空间的设计和塑造过程，更为直观地展示了空间生产的构念和图式。

综上，空间生产理论在学科视野和研究视角上呈现出多元交织的特点，研究转向为解释遗产重生的发生机制提供了理论借鉴。文化遗产作为社会共同的文化记忆，物理空间是其价值存续和表达的载体，系统刻画空间形态的演化及其内在机制，亟需得到深度学术响应，同时也是对空间生产理论的延伸和拓展。

2 研究设计

2.1 案例地选择

扬州运河三湾生态文化公园（下称“三湾公园”）位于扬州城市南部，京杭大运河在这里河道弯曲回转，曲线优美，是重要的运河水工文化遗存。“三湾”原指历史上古运河扬州城区段宝塔湾、新河湾、三湾子的统称，现今演化为三湾公园的称谓。三湾公园所在片区占地面积 3800 亩，其中核心区占地面积约 1520 亩，片区内已无任何文化遗迹和历史环境，标志性景观为 1.8km 长的三段弯道。三湾公园的变化是城市化进程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缩影。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一区域是扬州南部的城乡结合部，聚集了农药厂、制药厂、发电厂、皮革厂等一系列工业项目，加之拾荒和收旧货的人在河边乱搭乱建，环境脏、乱、差，污染尤为严重，是扬州城市生态环境建设亟需整治和改造的区域。

2010 年，扬州市委、市政府《关于建设创新扬州、精致扬州、幸福扬州的实施意见》中明确了对古运河进行全线整治，提升三湾片区两岸环境的要求，并于 2014 年纳入全市 30 个重大城建项目之一。时年开始，扬州市以区域内运河湿地资源为依托，按照生态修复、城市修补的理念，对三湾片区开展搬迁企业、拆除码头、清理违建等基础性工作，实施水系疏浚、驳岸改造、湿地修复、绿化建设等工程建设。经过三年多治理，2017 年 9 月，三湾公园正式对外开放。2018 年 12 月被评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面向市民和游客免费开放。2019 年 12 月，由扬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主持完成的《大运河扬州段文化旅游带概念性规划》中，三湾片区是六大重要发展区域之一，并承载起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双重责任。2021 年 6 月，位于三湾公园核心区域的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正式建成对外开放，系国内首个全流域、全时段、全方位展示中国大运河时空演化的现代化博物馆。至此，不到十年时间，三湾公园在空间形态上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原本并未列入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点的地段，在空间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中，遗产价值与功能产生了全新的变化，以另一种方式实现了运河遗产的重生，将其作为案例地具有重要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2.2 数据来源及选取

为系统刻画三湾公园的空间变化，本文运用历时数据信息分析不同时期三湾公园片区空间区划和土地功能的演化情况。数据来源于 Landsat 及谷歌遥感影像数据和案例地相关的地图信息，根据关键时间节点绘制了 1955、1990 及 2020 年三个时段的三湾片区功能布局图。其中，由于 1955 年无公开数据，故通过同时期扬州市地图进行绘制，参考地图包括《扬州城厢图》（1950 年 2 月）、《扬州市市区图》（1952 年 10 月）、《扬州市全图》（1955 年 1 月）、扬州市城区图（1957 年 3 月）、扬州市市区图（1963 年 12 月），将各个地图三湾的功能区布局比对而绘制成图。1990 年的遥感影像数据来源于美国地质勘探局（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 USGS），为 Landsat5 卫星数据，为便于观察均选取云量小于 3% 的遥感影像，同时参考了同时期的扬州市区

游览交通图（1988 年 9 月、1994 年 5 月）、扬州市城区图（1990 年 7 月）等进行绘制。2020 年影像数据来源于 USGS 的 Landsat8 卫星数据和谷歌地球。

在分析阶段设定上，将 1949 年作为空间演变的起始年份是因为扬州三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地图资料缺失严重，且战争造成了部分运河形态消失，当时的混乱社会局面也更难以从空间生产视角加以考察。将 1958 和 2014 年作为三个阶段划分点的依据是扬州于 1960 年前后提出沿古运河布局工业的发展战略，在 1958 年三湾区域的第一座工厂——扬州农药厂建立，故可作为区别农居空间与工业空间的标志。而 2014 年扬州正式启动三湾公园的建设工作，因此可作为第二、三阶段的划分节点。此外，本文选取了各阶段的代表性年份进行截面分析，选取 1955 年作为第一阶段的截面年份源于 1960 年前后扬州市开始布局沿古运河的工业区规划，1955 年的图像数据可反映工业区形成前三湾片区的空间形态，且该年份的地图资料较为充分。到了 1990 年代工业区布局已趋于完整，其后一直到 2010 年其功能区变化并不明显，故选取 1990 年三湾的影像数据作为工业时期代表。而 2014 年后，三湾生态文化景区建设思路逐步完善，选取 2020 年影像数据作为文旅融合发展时期的截面代表较为恰当。同时，也考虑到 1955—1990、1990—2020 年两个时间段的跨度比较接近，用于对比相对更为合理。

2.3 研究方法

2.3.1 遥感影像分析

本文首先使用 Envi5.3 对遥感影像进行预处理，并通过 ArcGIS10.5 对数据进行可视化处理，绘制了三个时期三湾的功能布局图。其中功能区分为 10 类，即农业区、住宅区、工业区、工业遗址、旅游区、村庄、水域、绿地、荒地和其他。其中，“工业遗址”指工厂搬迁遗留的厂房，主要是扬州农药厂遗址，将作为工业及其他形式的旅游开发；“绿地”指独立于其余功能区之外存在的绿化区域，旅游区和住宅区等也分布着绿地，但因覆盖在其余功能区之内难以区分，故不重复计算。此外，由于 1955 年的地图资料未标注森林、草地等绿化图示，故在研究中将该时期绿地面积表示为 0。“其他”指除上述功能区之外的类型，包括政府部门用地、学校、餐馆、超市等，因与研究关注内容无关，故归为一类。

2.3.2 功能区土地利用变化分析

在影像分析和制图的基础上，计算出每个时期各功能区的土地面积，并通过土地利用变化强度和速度（式 1、式 2）反映三个时期功能区面积变化情况。

$$S = U_i \times \frac{100}{U \cdot T} \times 100\% \quad (1)$$

式中：S 代表土地利用变化强度，S 值越大说明该功能区类型变化越剧烈； U_i 为第 i 种功能区在某一时期面积变化量的绝对值；U 为所有功能区面积变化量绝对值之和；T 为研究时期长度，单位为年。土地利用变化强度主要描述功能区面积变化的强弱程度^[40]。

$$K = \frac{U_b - U_a}{U \cdot T} \times 100\% \quad (2)$$

式中：K 代表单一土地利用动态指数； U_a 和 U_b 分别为某一功能区期初与期末的面积；T 为研究时期长度，单位为年。用于测度功能区面积的变化速度^[41]。

2.3.3 实地调研和访谈

本研究于 2020 年 11 月和 12 月, 2021 年 1 月和 6 月多次前往案例地进行实地调研, 将三湾片区的实际布局与 2020 年的遥感影像进行比对完善, 并对景区部分游客和居民进行半结构化访谈, 访谈内容主要涉及在三湾的游览感受和对其旅游发展现状与特点的评价等。为深入揭示三湾运河遗产的文脉更迭与重生机制, 在 2021 年 9 月以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对三湾景区管理者和部分周围居民进行了访谈, 内容主要关于三湾的历史演变及旅游发展与规划。

2.3.4 志书分析

为多渠道获取三湾的有关资料, 把握空间生产规律, 综合了《扬州市志》(上、中、下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 年版)、《扬州市志(1988—2005)》(方志出版社, 2014 年版)、《扬州农药厂志(1958—1987)》(扬州农药厂志编撰组, 1988 年)、扬州文化志等史册资料, 作为佐证材料, 对三湾运河遗产重生过程和机制进行分析。

3 三湾公园的空间形态演变

3.1 基于功能区布局变化的遗产空间形态趋演

3.1.1 第一阶段(1949—1957 年): “耕”“坊”“荒”杂糅的农居空间

这一时期是工业功能介入之前的阶段, 三湾位于扬州郊外, 古运河贯穿其中, 水域面积为 0.83km^2 。大量未开发利用的荒地是该阶段的空间形态特征, 占三湾总面积的 52.26%。在荒地之外, 分布最广的依次为村庄、其他和农业区, 占比分别为 16.34%、6.77%和 4.71%。其他类功能区主要为庵庙和小商店等, 村庄的居民大多是农户。而农业区则是由村庄农户生产劳作实践的空间延伸而出现的衍生空间。农业生产实践和生活实践在日常生活内容的互补将农业区与村庄的空间联系不断深化。农户在运河畔依水而耕, 沿三道湾口耕耘农田, 引运河水灌溉农作物。该阶段三湾还存在小范围的工业区, 仅占总面积的 3.12%。工业区位于古运河上游段, 紧挨城区分布着几家厂区, 如面粉厂等, 基本以作坊形式进行生产, 未形成工业化规模。因此, 第一阶段三湾形成了以村庄农田主导, 同时伴以工厂作坊和荒地夹杂的农居空间形态(图 1)。



图 1 各时期三湾片区的功能区布局(1955、1990、2020)

3.1.2 第二阶段（1958—2014 年）：工业集聚与无序扩张下的异化空间

1958 年初，在全民办工业的热潮中，扬州开启沿古运河布局规划建设工业区的发展战略。其后在较短的时间内，三湾片区成为工业生产的集聚区，在城市规划中被划为南部工业区。期间陆续有农药厂、化工厂、线路厂等在此建立，其中扬州农药厂是最早进驻的工厂，也是三湾工业区的代表。到了 1990 年，三湾工业区形态趋于完整，但功能区布局单一，具体表现为：①农业区快速消退，原有农业区被工业区挤占。②住宅区开始嵌入三湾空间，但比重较低，仅为 0.99%，位于古运河上游段且毗邻工业区。③工业区面积增长迅速，至 1990 年工业区面积已达到 1.24km²，土地利用变化强度为 70.13%，土地利用动态度为 18.66%，成为三湾片区的主要功能区，占比 29.34%。④旅游区部分区域消失，面积减少了 46.65%，缩减强度和速度分别为 1.50%和 1.33%，说明是在长年的空间演化中逐渐淡出。⑤村庄面积在工业空间压迫下减少了 35.12%，余下的村庄也被工业区所包围。⑥古运河主河道基本不变，但部分河道和小湖泊消失，水域面积减少了 36.47%。⑦荒地面积减少过半，缩减态势明显，大多被用于工业生产，但仍有 1.01km²荒地未得到有效使用，其比重占当时三湾总面积 24.00%，主要分布在古运河西岸（图 1）。

在工业主导下，长期缺乏治理约束的工业生产造成了三湾片区水质和土壤的严重恶化。1998 年扬州市政府曾围绕防洪工程和水环境保护，对古运河城区段进行整治，以恢复河道原有行水、排涝及通航能力，改善水质。但由于三湾位于老城区南部，偏离城区中心，运河的水环境整治线路难以通达至此。到 2001 年，运河三湾段水质已劣于 V 类，片区内本用于工业供水的第二水厂也因水源水质恶化于 1997 年关闭。随后的十年中，该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扬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2—2020）》提出推进城市化和城镇发展同建设扬州沿江产业带、沿大运河产业带互为支撑，将三湾片区划入西南分区，功能定位是以高新技术和一类工业及科教产业为主的分区。《规划》还提出要通过沿河空间的塑造体现扬州悠久的历史文脉，开发特色水上旅游线。引导并鼓励建设项目向西部新区、南部工业园区集聚。而三湾恰好位于西南分区，陷入了水系整治、旅游开发和工业集聚并举的尴尬境地。这一时期，三湾片区因沿运河工业集聚而表现出空间生产的狭隘性，无序扩张的资本在空间中过度繁殖，无可避免地导致资源浪费和环境恶化，空间生产异化并主导了该时期三湾片区的空间形态。

3.1.3 第三阶段（2014 年至今）：后空间秩序重构下的运河生态文化空间

2014 年以来，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大运河文化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对标《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中办发〔2019〕10 号）等政策要求，三湾片区正式启动了生态环境整治和规划建设工作，功能区土地利用变化强度与动态度指数相比上一阶段有较大提升，布局趋于多元化。在重构作用下的三湾逐渐演化为以运河生态主导的文旅空间，表现为工业区和荒地面积大幅缩减，缩减强度分别达到了 71.59%和 34.59%。两者缩减强度和速度的不匹配，也表明了渐进式的拆迁和开发过程。在该过程中，工业区和荒地被拆解为多类型的功能区，工业区部分工厂遗址被保留用作工业旅游开发，其余土地主要演变为住宅区和旅游区。尤其是旅游区，面积增加强度和速度分别为 73.14%和 114.48%，空间拓展态势十分剧烈并不断得到深化。此外，其他类型的功能区 161.99%的面积增加幅度和 34.59%的扩展强度，也丰富了三湾空间生产的多元性，该功能区包括学校、商城、酒店、超市等。需要注意的是，1990—2020 年绿地面积减少是由于 2020 年住宅区、旅游区和其他等功能区内还有大量绿地因避免功能区重叠而未统计，实际情况绿地面积必然呈增长趋势（图 1）。

此外，为塑造运河生态文化空间，三湾在“一轴四区”总体规划方案中优化了“综合性文旅项目”开发模式，将旅游空间嵌入其中。其中，一轴为运河文化带，四区包括大运河博物馆及非遗文化园、运河文化公园、运河文化创意、总部经济及滨水工业遗址公园等四个板块。前三个板块以运河为核心，包括美食体验、主题客栈、商务娱乐等项目，通过将运河作为三湾文旅空间的主要生产对象，使运河文化活化于片区空间形态之中。同时，串联扬州主城区的古运河水上游览线贯穿三湾，以运河滨水休闲带作为枢纽，将其与瘦西湖景区连接起来，与扬州其他景区实现了联动效应。工业遗址公园则保留了部分前工业空间的生产厂房，以扬农集团（即产权制度改革后的扬州农药厂）为主，在文旅空间中注入了工业旅游形式。片区内及其东侧一带的住宅区也因三湾对外开放而逐渐被运河空间所同化，三湾成为周围居民日常休憩与休闲的生活场所，空间形态趋于多元（图 2）。



图 2 三湾公园的空间规划简图(2019)

3.2 基于空间形态演变的遗产文脉更迭

3.2.1 农业生产时期的运河农耕景观文化

工业项目进驻三湾片区之前，空间实践活动和改造行为较少，整个片区文化生产原始且单一。但这期间的运河文化景观具备较好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部分斑驳的河岸也是具备一定历史元素的空间表达^[42]。由真实性而生产的运河景观文化规避了符号化泛滥的变异现象^[43]，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了纯粹的运河生态文化。另一方面，三湾片区的垦荒、耕作、灌溉等农业生产实践都因运河而兴，运河水源及沿岸土壤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便利，记录下了农民生活与劳作投射下的空间轨迹与印痕^[44]。因而，运河孕育下的农业生产景观也是该时期文化生产的另一形式。由于农民在这一区域的空间实践主要归集在集体农田，很少踏迹荒地，于是分布最广的荒地在空间上的社会性被农居空间所抽离和占据，同时也被三湾周围的外延空间所抵拒，造成了其文化表征的失秩与虚化，运河遗产的空间表达呈现空洞状态。

3.2.2 工业生产时期的工业景观及内部“生活圈”文化

三湾片区在工业化进程中，工业污染致使运河遗产的真实性逐渐瓦解甚至泯灭，运河景观文化在工业化时期出现了变异，集中表现为：①工厂集聚占据进而替换了农业空间，农耕文化景观逐渐消逝。②工业生产构成的工业景观成为该时期的文脉主线，沿河高高矗立的烟囱和一排排方形建筑是此阶段三湾片区的真实写照，工业景观占有了土地和河道，“车间”“流水线”“原料加工”等符号即是该文化生产下典型的文化表征形式。③运河之上，来往运输货物的船只穿行不息，在原本相对静态的工业景观中注入了航运流动性景观，拓展了三湾片区的工业景观。④运河原有风貌被破坏，运河景观失去表征符号，遗产价值让步于工业增值，运河遗产走向断层。

尽管工业景观的快速扩散往往会导致地方的“去生活化”，但在三湾的工业化历史中，工业景观却带来了“还生活化”的现象。以扬州农药厂为例，作为三湾工业区的核心厂区，在产权和制度改革中企业规模逐步扩大，职工人数不断增加。为满足职工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农药厂对宿舍和食堂进行了多次新建和扩建，修建了池塘和假山，栽植了绿化长廊，改善了职工生活环境。另外，企业成立了教育科以提高职工文化素质，为此增加了教育培训场所和设施。为满足厂区规模扩大后的各类保障需求，以扬州农药厂为代表的企业兴建幼儿园、电影院、医务室等配套场所，为职工提供了多方位的生活服务。因而，工业化阶段的三湾片区在环境、教学、娱乐和医疗卫生等领域，创造了工厂内的“生活圈”，调和了单调的工业景观。由此可见，这一时期三湾片区的文化生产虽是工业生产主导，但同时叠加了“还生活化”的场景，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三湾片区的空间生产方式，工业景观糅揉“生活圈”的文化空间成为该时期运河遗产的文化表征形式。

3.2.3 生态文化建设时期的多元文化交融共生

致力于打造生态文化示范区的三湾公园，以修复后的运河生态景观作为空间生产的基底。经历了断层的运河文化焕发出新的生机，以文化展演、文化体验及互动沉浸等形式为主线文化生产方式，诠释了运河文化的表征逻辑，并通过“深化”“扩展”“移植”等手法将运河遗产价值再现于渐趋完整的三湾文化空间，重生的运河文化成为该时期文脉的核心内涵。扬农工业遗址经过保留和改造，在三湾规划中将以工业旅游形式重新开放，以此作为工业时期的见证。工业景观从而得以延续并融入当下的文化生产，丰富了文化景观层次。虽然工业时期的内部“生活圈”已随拆迁消失，但在文旅开发下三湾演变成成为开放式的流动空间，吸引了外部社区的“生活圈”，居民在这里休闲放松，日常生活实践融入三湾文化生产中。遗产重生后的社会影响吸引了寻求运河文化体验的游客在三湾探寻历史变迁下的运河空间，与居民实践共同构成了文化旅游景观。

此外，在现阶段多元文化交融的三湾文脉中，代表过去的“运河文化”及工业“怀旧景观”、当下的运河生态与旅游休闲景观和未来的创意文化，不同时间跨度的文化在同一时间点和同一空间中相互作用共生，从建构主义视角塑造了运河三湾段遗产的真实性，体现了三湾文脉的历史性、当代性和未来性，实现了其在空间和时间尺度上的多重意义表达^[45]。

3.3 空间生产的嬗变特征

3.3.1 资本循环下的产业置换

三湾的产业置换随着时间推移呈现出递进规律，三个阶段分别依次对应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并且产业递进过程中体现的是取代关系而不是互补或兼容。该规律下的产业置换遵循了“资本三重循环”模型的逻辑架构，在第一重循环中，资本在三湾首先投向第一产业，用于购买农业生产资料。当农业生产无法达到预期收益时，资本便转向第二产业，进行工业生产，进一步固化了第一重循环。而随着工业生产过剩及其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为缓解一重循环引发的危机，资本将视角转向对物质空间的塑造，进入了第二重循环。这时三湾的生态环境得到全面整治，征地拆迁工作有序铺开，基础设施建设也加快了步伐。重塑后的三湾片区建立了湿地公园，空间俨然成为一个整体，在自我生产中提取价值，其实质是遗产重生而增加了土地价值^[46]。但此阶段第三产业的结构处在失衡状态，遗产重生只停留在物质形式，重生的不完整性又会导致固定资产贬值的风险，于是资本第三重循环介入空间生产，投向文化、科教等社会性领域。在该循环下，通过对运河的活化保护与文旅开发，填补了遗产重生的缺失内涵，为三湾空间创造了附加价值，三湾也由湿地公园更新为运河三湾生态文化公园，第三产业发展趋于合理化、均衡化。至此，资本结束了循环周期，但仍在空间内流动和生产。产业停止了置换，但其结构仍在不断调整中，两者仍在三湾空间内不断作用。

3.3.2 空间边界的出现与消融

农业生产时期的三湾片区以农居空间为主，区域内遍布荒滩和农田，除农户生计外几乎无人足迹，同三湾外的市区景观呈现出空间上的异质性。因此在地理空间上阻断了三湾与外部的连通，形成了社会空间内外交流联系的闭塞，为三湾片区划设了自然

和社会的双重边界。1958 年成立工业区后，原有的荒地农田逐渐被工厂取代，天然的空间边界消失。然而基于生产安全性和对社区影响的考量，三湾工业区内厂房通常都设置围墙，出入工业区的大多是工厂工人，与城市的社会联系局限于工业领域。古运河承担的主要是航运功能，属于工业景观范畴，与城区段人们沿河而居的空间场景存在显著差异。因而，工业生产对三湾空间进行的边界划分，使得运河工业景观的界限十分牢固并同城区运河景观相矛盾，三湾与城市空间的联系处于疏远状态。

在 2014 年三湾公园启动建设后，随着旧厂区拆除和整治建设，形成了生态文明建设和城市开放空间并存的状态。旅游部门开通的运河水上游览线贯穿三湾，以游路方式将其与城市空间连结成一体，空间实践的秩序重构弱化了过去人为屏障的空间边界。地理边界的开放延展了三湾文旅空间的生产场域，其一表现为空间旅游化及日常化使三湾成为主客共享的重叠空间，运河的文化主体不再是话语权力，而是转移至社区居民与游客。他们在三湾的实践活动以及对运河“文化材料”的再生产^[47]，于社会层面加强了片区与外界的多元交流，消弭了空间的边界领域感。其二表现为遗产重生后的三湾运河文化重现于三元一体的空间生产框架中，水上游览线在将三湾与城区贯通的同时也将运河文化在城市空间中融为一体，片区从郊区转变为城区，三湾运河表征空间与城市运河空间从对立走向融合，消解了空间边界。

3.3.3 空间叠写下的辩证性、继承性与逻辑连贯性

空间叠写体现的是空间实践中生产出不同于原生空间的行为与过程，是空间生产嬗变的表现形式。叠写空间与原生空间产生的继承性或割裂性，是空间叠写辩证性的体现。而辩证性的判别在于空间叠写的限度，当空间生产在历史逻辑的轨迹下选择性地继承原空间的形态特征，原生空间在限度之内经叠写而升华，空间性质结构趋于稳定。若在历史逻辑的脱节下摒弃原生空间要素，失去了逻辑连贯性，则会遭遇空间叠写限度，导致空间生产矛盾^[48]。

三湾从农居空间演变为工业空间，空间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重组。工业空间占据了农田景观，货船与污染排放磨灭历史逻辑下的运河景观，遗产的历史继承性出现断层。工业集聚的空间生产僭越了叠写限度，致使异化现象主导了工业空间。此时期叠写空间与原生空间的割裂性体现了空间叠写的负面作用。第三阶段的生态文化空间中，秩序重构仍是空间生产嬗变的驱动力量，但与工业空间叠写截然不同。生态修复和文旅开发等空间实践将断层的运河遗产文化再现，接续了初始时期的运河空间形态。工业遗址的保留改造浓缩了过去的工业景观，原生空间融入叠写空间。这一时期三湾空间叠写遵循了历史发展逻辑，地理与文化的同一性内嵌于空间生产，体现了空间叠写的积极作用，维护了空间正义^[49]。

3.3.4 运河遗产价值的转移、加权与让渡

三湾空间嬗变伴随着运河遗产价值的转移，农居空间下运河价值一部分转移至农业生产中，主要用于农田拓荒与灌溉；另一部分凝结于运河本体内，表现为真实完整的古运河景观。工业空间下三湾片区运河遗产价值转嫁至工业景观上，凝结于运河本体的价值被分离转化。此时运河价值在工业空间中均以外化于物理空间的方式呈现，具体为三种形式：一是运河沿岸的土地被工厂占用；二是运河经第二水厂抽调为工业用水（因水质不达标，无法用作生活用水）；三是作为货船往来的水上航道。工业用途的运河价值显然与真实性的运河价值背道而驰。三湾公园的建立，对运河价值进行了重新分配与加权。首先通过生态修复将运河的工业用水与航道价值转化为初始的运河景观价值，并融入了城市运河空间中。其次围绕运河文化建设的文旅项目将运河价值从土地资源中剥离，对其进行加权叠写，运河价值以文化再生产的方式得到最佳呈现。最后将部分运河价值让渡于社区及游客，居民与游客在体验实践中感知到了运河的遗产价值，甚至觉得自己就是遗产的拥有者^[50]。

4 三湾公园的遗产重生机制

4.1 运河遗产重生的逻辑诠释

三湾片区的空间生产在历史变迁中持续演变、文脉不断更迭，空间形态由初始状态经历了断层和重生的过程。在第一阶段农

居空间中，古运河三湾段处于初始状态。片区内人为活动稀少，空间结构单一，此时未遭受大规模污染和破坏的运河遗产最具历史维度的真实性。工业化时期，工业生产集聚下空间的异变阻断了运河遗产在这一区域的真实性和连贯性，运河遗产消弭在机器轰鸣声与货船汽笛声中。工业区的封闭性加上运河航运功能，割裂了古运河城区段与三湾段的连结，三湾空间在扬州运河文化空间中趋于边缘化^[50]，这也使得扬州城区的运河廊道文化在三湾出现了断层。而遗产从断层走向重生的标志是三湾公园项目的启动，构成三湾空间生产第三阶段的开始，该阶段三湾空间经过修复、整合、衔接与重构，更新为生态文化空间，并将文旅项目嵌入其中。正义维度的空间转换与城市运河空间的再生产重生了运河遗产^[51]。同时，基于遗产真实性，片区适当保留工业遗产景观，形成了线性文化遗产与工业遗产的双重逻辑，工业遗产依附于运河遗产重生的框架。

4.2 运河遗产重生的机制解析

4.2.1 空间表征：遗产重生的主导力量

空间表征是空间塑造的主体力量，属于社会经济空间，支配着空间要素与生产关系。在运河段三湾遗产重生的动力机制中，政府、规划方和景区等多方主体共同构成了遗产重生的权力话语框架。2010 年之前三湾还是工业区时，扬州市委市政府提出建设三湾湿地公园，拉开了运河三湾段遗产重生的序幕。随后在征地拆迁及生态修复方面的财政和政策支持都来源于政府。三湾文旅模式和空间规划布局则由规划团队完成并由景区落实，景区的餐饮娱乐等商家入驻是政府促进下资本循环的表现。可见，运河三湾段遗产重生是全社会多方参与、政府主导的体系架构，通过空间表征对遗产地进行意志表达和顶层设计。

4.2.2 空间实践：遗产重生的物质载体

空间实践属于自然空间中的物理形态范畴，在空间表征的指引下，三湾首先实现了遗产物质空间的重生。运河遗产重生的自然条件如生态、土地、设施等在空间实践作用下完成生态修复和空间秩序重构，单一的工业用地转化为多元功能的旅游用地，狭隘的物质空间演变为复合型物质空间。中国大运河博物馆等重大文旅项目的设计建造构成了空间生产的物理介质，贯穿于三湾自然空间，为遗产重生提供了空间载体。

4.2.3 表征空间：遗产重生的文化建构

表征空间是精神文化表达的场域，在旅游语境中也是居民与游客的共享空间。依托于空间实践构成的自然空间，表征空间将历史文化资源禀赋嵌套其中，赋予自然空间以灵魂，使遗产文化在“形”中传“神”^[52]。例如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搭建了运河文化的生产空间，博物馆内的各类陈列展演与体验项目凸显了博物馆的文化价值及存在意义。居民和游客的介入则促使文化再生产向日常生活与旅游生活转变，双方的互动与实践丰富了文化再生产的内涵，叠写出不同于遗产文化的多元文化空间^[53-54]。因此表征空间承载了遗产重生的文脉传承，基于物理空间基质，即空间实践的物质表征，通过主客共建的作用，拓宽并分化了文化再生产，使得多元文化在三湾场域融合共生，多方主体共同完成了遗产真实性与文化价值的建构^[55]，实现了遗产文化重生的过程。而文化再生作为遗产重生的本质，表征空间的文化建构也为遗产重生规定了性质及意义，决定了遗产重生的发展向度。

运河三湾片区遗产重生机制伴随着空间生产的过程（图 3）。首先，最初农居时期的遗产景观经过工业集聚的产业布局后出现了空间异化现象，初始的运河遗产景观出现了断层，运河文化被工业空间所异化替代。其次，进入生态文明建设时期后，生态文化导向的旅游利用有效维护了三湾的空间正义，即实现了生态修复、遗产保护、人文关怀等过程，可被概括为空间的再生产（空间秩序的重构）。基于“三元一体”的解释框架，由“三位一体”到空间生产主体，构成了不同的空间形态，反映了遗产重生的作用机制。其中，空间表征是政府、规划方和景区等权力话语主体的代表，对遗产地的空间生产进行顶层设计，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系遗产重生的主导力量。在空间生产理论中，空间表征对应着社会空间范畴。在空间表征的指引下，诸如基础设施、建筑等空间实践的客体完成了生态修复和空间重构，工厂搬迁、河道治理、植被种植、大运河博物馆建造等等，都包含其中，因而其指代的是物理空间，也是运河遗产重生的物质载体。同时，空间实践表征的对象，即为表征空间。表征空间代表文旅项目、居

民与游客等主体，主体间的互动实践丰富了文化生产的形式，构成了多元融合的遗产文化空间，在遗产重生的过程中，发挥了文化建构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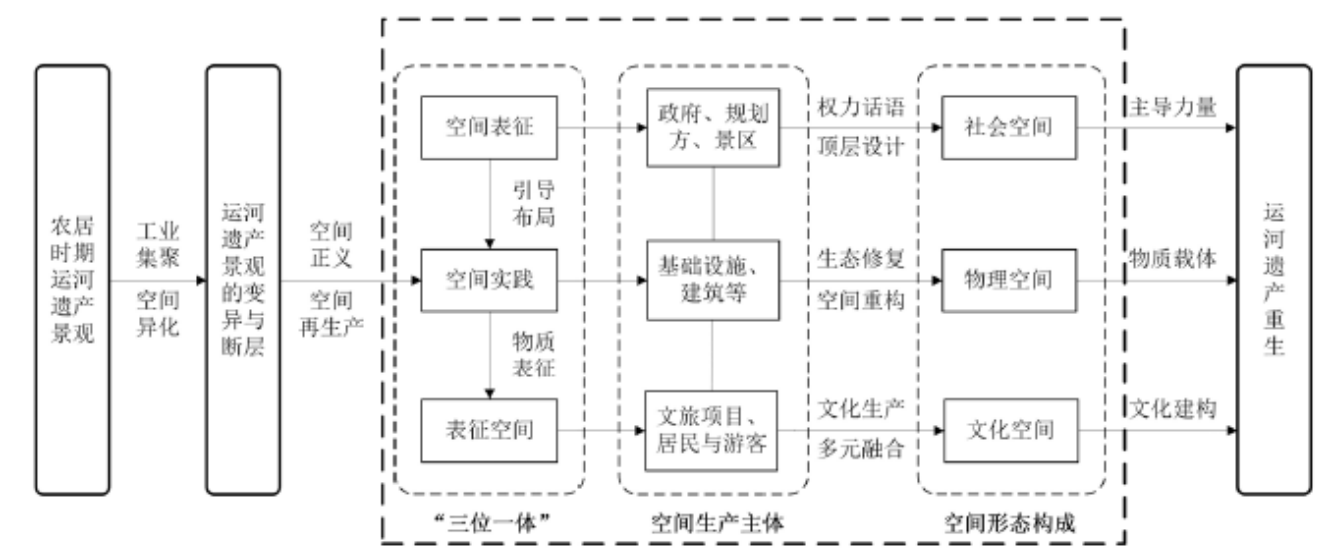


图3 运河三湾片区遗产重生机制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空间形态演变的角度，刻画了三湾公园在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和生态文化三个时期的遗产文脉更迭特征，揭示了遗产地空间生产的嬗变规律，诠释了运河遗产重生的内在逻辑，从空间表征、空间实践和表征空间提出了遗产重生的发生机制，主要结论如下：

①“农居—工业—文旅”是运河遗产重生的典型路径。三湾公园作为运河遗产重生的缩影，从土地利用功能变化与空间演化的特征看，空间生产过程经历了“耕”“坊”“荒”杂糅的农居空间、工业集聚与无序扩张下的异化工业空间和后空间秩序重构下的运河生态文化空间三个阶段，呈现出遗产重生的路径与方向。

②运河遗产重生伴随着遗产价值非线性变化的文脉更迭历程。文脉更迭贯穿到遗产空间形态演变的过程中，先后经历了农业生产时期的运河农耕景观文化、工业化时期的工业景观及内部“生活圈”文化以及生态文化建设时期的多元文化交融共生三种形态，伴随着遗产的真实性、遗产异化与断层和建构主义的遗产真实性的回归过程，遗产重生的价值和意义超越了遗产的本身。

③运河遗产重生体现了空间生产多重嬗变的逻辑递进特征。从空间生产的嬗变特征上，遗产重生伴随着资本循环视角下产业置换的过程，由农业到工业再到生态文化建设的转化伴随着空间边界的出现与消解的过程，空间生产也是空间重构的过程，空间叠写使得三湾文化空间演变更加符合遗产重生的历史文化逻辑。在不同的生产阶段，体现的是运河遗产价值在不同主体间的转移、加权与让渡的过程。

④运河遗产是具有“三元一体”多维建构机制作用的过程。在遗产重生的发生机制上，遵循了空间生产的内在规律。空间表征上体现的是遗产重生的主导力量及其对遗产社会空间的建构。空间实践上体现的是遗产重生的物理空间，同时为遗产重生提供物质载体。表征空间体现的是遗产重生的文化空间，从文化建构上推动了遗产的重生。

⑤主客共享的遗产空间场域是运河遗产重生的根本目的。运河三湾自建成景区以来,除有游客游览外,也吸引了不少周边居民在此休闲游憩。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三湾及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正式开放后,成为来扬游客“打卡”的第一站,居民也热衷于参观运博,同时也吸引了周边地区旅游相关部门人员前来交流学习,三湾逐渐成为主客共享的遗产空间,游客与居民在同一场域进行旅游活动和生活休闲。

以上结论是对不同时代背景下三湾公园空间形态演化和功能转换的分析,籍此揭示遗产重生的内在机制和规律特征。物理空间形态演变分析是对遗产地具象空间的研究,辅之以多种文献资料分析和访谈进行佐证,形成了相对严谨的研究架构。但是,遗产重生是多重力共同作用的复杂系统,空间生产理论可以用于阐释其中的阶段性特征和演化机制,但如何评估遗产重生的复合动力和综合效应,亟需构建遗产地空间生产的效应评价体系,围绕空间效益、空间效率与空间公平等维度,从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视角系统分析遗产重生的动力与阻力,为新发展阶段实现大运河文化的保护传承利用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这是本研究今后要深化的方向与目标。

参考文献:

- [1]过国忠. 古运河要重生, 该如何发力[N]. 科技日报, 2020-11-18.
- [2]康琦, 赵鸣. 工业遗产地的景观再生[J]. 工业建筑, 2016, 46(7): 93-96, 101.
- [3]Xie P F. Developing industrial heritage tourism: A case study of the proposed jeep museum in Toledo, Ohio[J]. Tourism Management, 2006, 27(6): 1321-1330.
- [4]丁小珊. 三线工业遗产文化记忆的再生路径研究[J]. 社会科学研究, 2021(3): 198-206.
- [5]曾锐, 李早. 城市工业遗产转型再生机制探析——以上海市为例[J]. 城市发展研究, 2019, 26(5): 33-39.
- [6]陈平. 文化遗产的再生与利用[J]. 中外文化交流, 2021(4): 63-67.
- [7]Tunbridge J E, Ashworth G J. Dissonant heritage: The management of the past as a resource in conflict[M].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96.
- [8]罗钢, 刘象愚. 文化研究读本[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 [9]厉新建. 文化旅游、旅游凝视及其他[J]. 旅游学刊, 2013, 28(11): 8-10.
- [10]唐宁, 潘天波. 江苏大运河文化记忆场所的建设及其活化传承[J]. 南京社会科学, 2020(2): 150-156.
- [11]Moore Kevin, Buchmann Annæ, Månsson Maria, et al. Authenticity in tourism theory and experience. Practically indispensable and theoretically mischievous?[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21, 89(2): 103208.
- [12]范春. 古镇多元文化空间生产的冲突与调适——以C市H区L古镇为例[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 40(5): 89-95.
- [13]郭文. 社区型文化遗产地的旅游空间生产与形态转向——基于惠山古镇案例的分析[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版, 2019, 46(2):75-82.

[14]Cai J,Peng J.Introduction of Beijing-Hangzhou Grand Canal and analysis of its heritage values[J]. Journal of Hydro-environment Research, 2019, 26:2-7.

[15]李飞. 线性文化遗产空间结构演化研究——兼述旅游于其中的影响[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19, 35(5):133-140.

[16]万安伦, 刘浩冰. 国家视野中大运河的历史形象变迁与出版文献探析[J].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 23(5):73-80.

[17]汪原. 关于《空间的生产》和空间认识范式转换[J]. 新建筑, 2002(2):59-61.

[18]明庆忠, 段超. 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古镇旅游景观空间重构[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46(1):42-48.

[19]李麦产, 王凌宇. 论线性文化遗产的价值及活化保护与利用——以中国大运河为例[J]. 中华文化论坛, 2016(7):75-82.

[20]Francis Farrelly, Florian Kock, Alexander Josiassen. Cultural heritage authenticity: A producer view[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9, 79:102770.

[21]颜敏, 赵媛. 国内外运河遗产旅游研究综述[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16, 32(5):626-630.

[22]朱晗, 赵荣, 郝桐笛. 基于文化线路视野的大运河线性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以安徽段隋唐大运河为例[J]. 人文地理, 2013, 28(3):70-73, 19.

[23]Martorell Carreño A.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spirit of the place in the living cultural routes: the Route of Santiago de Compostela as case study[C]//16th ICOMOS General Assembly a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Finding the spirit of place between the tangible and the intangible". Quebec, 2008.

[24]汪芳, 吕舟, 张兵, 等. 迁移中的记忆与乡愁: 城乡记忆的演变机制和空间逻辑[J]. 地理研究, 2017, 36(1):3-25.

[25]刘朝晖. “被再造的”中国大运河: 遗产话语背景下的地方历史、文化符号与国家权力[J]. 文化遗产, 2016(6):60-68.

[26]孙全胜. 论马克思“空间生产”的理论形态[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49(3):36-46.

[27]庄友刚. 西方空间生产理论研究的逻辑、问题与趋势[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1(6):116-122.

[28]马学广. 城中村空间的社会生产与治理机制研究——以广州市海珠区为例[J]. 城市发展研究, 2010, 17(2):126-133.

[29]Michael Leafy.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hrough a shrine and vendetta in Manchester: Lefebvre's spatial triad and the regeneration of a place renamed Castlefield[J]. Plan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2009, 10(2):189-212.

[30]包亚明. 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
- [31]Lefebvre H.The Production of Space[M].Oxford Ok and Cambridge USA:Blackwell,1991.
- [32]大卫·哈维.列菲弗尔与《空间的生产》[J].黄晓武,译.国外理论动态,2006(1):53-56.
- [33]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M].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 [34]孙九霞,许泳霞,王学基.旅游背景下传统仪式空间生产的三元互动实践[J].地理学报,2020,75(8):1742-1756.
- [35]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M].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 [36]Harvey D.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Capitalist Urbanization[M].Oxford:Basil Blackwell,1985.
- [37]龙启蒙,傅鸿源,廖艳.城乡一体化的资本困境与突破路径——基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三循环理论的思考[J].中国农村经济,2016(9):2-15.
- [38]王有正,张京祥.资本的城市化:基于资本三级循环理论的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发展初探[J].现代城市研究,2018(6):99-105.
- [39]黄剑锋,陆林.空间生产视角下的旅游地空间研究范式转型——基于空间涌现性的空间研究新范式[J].地理科学,2015,35(1):47-55.
- [40]王少华,梁留科.旅游产业集聚背景下遗产区土地格局演变及机理——以龙门石窟为例[J].经济地理,2015,35(12):216-224.
- [41]李维维,陈田,马晓龙.城市旅游综合体土地利用空间格局演变及驱动机制——以西安曲江为例[J].地理研究,2019,38(5):1103-1118.
- [42]Yi X,Fu X,Yu L,et al.Authenticity and loyalty at heritage sites:The moderation effect of postmodern authenticity[J].Tourism Management,2018,67(8):411-424.
- [43]晏晨.真实的地方:对现代城市遗产旅游的探讨[J].宁夏社会科学,2020(6):209-216.
- [44]孙九霞,张士琴.民族旅游社区的社会空间生产研究——以海南三亚回族旅游社区为例[J].民族研究,2015(2):68-77,125.
- [45]Park Eunkyung,Choi Byoung-Kil,Lee Timothy J.The role and dimensions of authenticity in heritage tourism[J].Tourism Management,2019,74(2):99-109.
- [46]丁凡,屈张.以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为特征的城市更新探析——以新加坡河的再生为例[J].建筑与文化,2021(1):181-182.
- [47]周宪.文化表征与文化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
- [48]郭文,朱竑. 旅游空间生产的叠写与认同[J]. 旅游学刊, 2020, 35(11):1-3.
- [49]张佳. 大卫·哈维的空间正义思想探析[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52(1):82-89.
- [50]Xu S,Liu Y,Qian Y,et al.The significance of the West Lake pattern and its heuristic implications for creating China's heritage tourism economics[J]. Tourism Management, 2017, 58(2):286-292.
- [51]胡大平. 旅游空间的正义之维[J]. 旅游学刊, 2017, 32(3):4-5.
- [52]孔润年. 文化建设的伦理审视[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 [53]Zhang R,Smith L.Bonding and dissonance:Rethinking the interrelations among stakeholders in heritage tourism[J]. Tourism Management, 2019, 74(3):212-223.
- [54]Khalid S.Al-hagla.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in historical areas using the tourist trail approach:A case study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 and Urban Development (CHUD) project in Saida,Lebanon[J]. Cities, 2010, 27(4):234-248.
- [55]Su Rui,Bill Bramwell,Peter A Whalley.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 and urban heritage tourism[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8, 68(1):30-40.